

- 封面题字：苏 藹
- 责任编辑：杨典求
- 封面设计：张玉梅

傅任敢教育文选

程禹文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4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16,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00册

ISBN 7-5041-0402-7/G·367 定价：6.00元

首都师大图书馆留存。

杨仁赠
1998.4.29



傅任敢 (1905—1982)



编辑说明

一、编辑《傅任敢教育文选》，主要是为帮助教育科学研究人员、师范院校师生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了解、学习和研究傅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参考。

二、本书选取傅先生有代表性的教育论文四十多篇，基本上反映出傅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轮廓，其中有的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所选文章的年限，系从1929年到1982年，大体上按其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三、解放前傅先生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论文，这次收录时对其中的讹误加以校正。同时，对选文作了题解和注释，个别不重要的地方作了删节。

四、限于篇幅，有些文章不能收入，为便于读者查阅，我们编成《傅任敢教育活动大事年表》和《傅任敢论文译著目录索引》附于书后，对读者全面地系统地了解傅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程禹文同志选编，苏欣、李元华二位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王文宝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1989年6月

目 录

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	(1)
不如归	(4)
湖南教育一瞥 (节录)	(8)
明德中学高中部教学规程	(15)
明德中学教务概要	(17)
小学教材随想	(23)
辑印《近代中国教育人物像传》缘起	(25)
雍正年间意大利的中国学院	(29)
《重庆清华中学校刊》发刊词	(35)
看报和演说	(36)
中学生的伙食问题	(42)
家信督导	(52)
花钱与记帐	(58)
彻底强迫的课外运动	(65)
从管帐到管钱	(74)
师范学院的中学关联	(78)
渝长絮语	(82)
《重庆清华》发刊词	(85)
和重庆清华中学同学的谈话	(87)
二二一制中学	(88)
再谈二二一制中学	(92)
改进作业检查方式, 提高教学质量	(99)
《学记》译述	(103)

怎样讲解 怎样问答	(144)
有关办好师范学院的四点意见	(147)
关于办好高师院校的一些设想	(151)
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意思	(154)
《论语》教育章句析解	
——孔子教育思想初探	(157)
尊师更应爱生	(166)
教学是最渊博最复杂的艺术	
——谈谈教学有方	(167)
“刺激人们创造和应用——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谈谈教学效果	(170)
教育史小品（五则）	(173)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173)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74)
“不愤不悱”怎么办？	(174)
古者胎教	(175)
古代年龄分期	(177)
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	(178)
情感与理智	(194)
克伯屈文化与教育	(208)
蜗逊心理保育论	(214)
桑戴克论教育的领域	(220)
法国中等教育之演变	(229)
夸美纽斯对几个重要教育问题的主张	(253)
附录一：傅任敢教育活动大事年表	(262)
附录二：傅任敢论文译著目录索引	(267)

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

年来国内政局，好比一道洪涛骇浪，奔腾冲击，使得一般青年不是发奋图强，努力革命工作，便是下趋坠落，葬送一生。其能按照故常，在学修习的，恐怕只是少数中之少数罢了。这本是变态社会中的常事，原也无可如何。现在革命告一段落，训政业已开始，社会秩序渐渐要恢复常态了，一方面国家急于需要建设的人才，一方面青年突然失了以前努力的对象，于是一个“青年失学问题”便为大家所注意到了。

青年失学问题本是一切根本问题中的最根本问题，理由只是：国家的将来属于现在的青年，而国家的繁荣又靠一国的文化程度。不过这个问题虽然这般重要，可惜国家力量一时有限，我们只好缩小再缩小，先来对于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求个解决。这种缩法，其实也有几层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为保证革命的成功起见。革命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的廓清堆陷，一是积极的发展设施，这是人人知道的了。从来各国革命，每有一个毛病，破坏的人有纯洁的动机，却没有设施的本领，建设的事务人员有设施的技术，却又没有远大的眼光。结果，顾全了廓清堆陷的彻底则忽略了建设的本意，顾全了设施发展的效率则又糟蹋了革命的精神。“党军北伐，官僚南伐”，原也是这个公式中的一例。自今以后，我们的理想革命家应该人人有革命党员的进取勇气，同时又有事务人员的办事效率。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专门的技能。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

才能在革命史上开一个新纪元。

第二个理由是为安定社会的秩序起见。果然能够舍去性命，为革命而奋斗的青年，总可当得起“有志气”三个字。不过志气只是创功立业的动力，却不是创功立业的工具。现在是在走向建设的时期了。所需要的有“志气”，也要“技能”。建设本是为建设而建设的，合不上它的两个条件的只好请便。那时万一一般有志气的青年还没有趁着这个机会习得一些专门的技能，则建设的事业为腐败分子所包办，革命青年离了负责任的地位，“技能”离了“志气”，相激相荡，社会秩序恐怕也就不容乐观，再革命何从避免？

第三个理由是为顾全各人的将来起见。革命青年的备尝艰难苦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应该知道的，不必说了。他们在立志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本已立下一个牺牲一切的决心！现成的性命且已置之度外，那还计及未来虚幻不可捉摸的酬庸？可是事情成功以后，享受成功的民众当然忘不了创造成功的勇士。古往今来，多少兴亡大事，一旦功成圆满，总是离不了创立功业的人，便是此理。平心而论，革命成功而后，我们坐享成功，对于那些创功立业的人总得有所答谢才对。从来答谢的方法很多，放官委差，都非得当。要知此番革命，出力者以青年为最多，他们学业尚未成就，便来担起这副担子，原也出于万不得已。现在到了他们可以歇歇的时候，若还不让他们歇歇，预备将来的担当。国家的将来，他们的前程，岂不白丢掉了？社会若是连他们的失学问题都还不能代为想法解决，岂是对于他们的正当酬庸？

这种简明的道理，见到的人也不算少。即如最近中央党部之制拟失学革命青年救济办法（见十一月三十日《申报》），和冯玉祥，广东建设广之派遣学生出洋求学，可见一般。

如果前面所说，尚非荒谬，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问：怎样使他们愿意续学？怎样使他们能够续学？使他们学些什么？

怎样使他们愿意续学？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大部分的有远识的革命青年，自己都有强烈的求知欲。现在只是环境没有这种便利，不是他们自己没有这种心愿。他们在“要”，用不着“使”。要外力促进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政府对于这极少部分的人所能做的似乎有两点：第一是从早严格执行考试制度，第二是保障事务人员。严格执行考试制度则没有幸进的机会，保障事务人员则服务政府不致横受摧残。那时大家知道要为政府服务只有这条门路，为政府服了务也不致白费精力，自然乐于从学问上用功了。

怎样使他们能够求学？这是极大的问题，也是极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程度，一是用费。以言条文上的解决，则中央党部的规定总算够详备了。至于实行如何，那是关于国家财力人力，不是逻辑的推论所能解决的。

使他们学些什么？这我有点意见。就个人兴趣而论，当然各人不同，亦不必强同。可是现在所讨论的是全国最有生气最有希望的革命青年，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不有较奢的希望。他们学习的标准似乎应该站在“国家的需要”和“革命的成功”上面来定。国家需要的是自然科学，凡有相当根柢的都该向这条路上努力理由极明，有话不必多说。就革命的真正成功而论，则革命青年最该努力的是师范，而最适宜于师范的也是革命青年。这次革命不是谁打倒谁，是为主义而革命的。革命的目的不仅在政权的取得，而在主义的实现。主义能否实现，全靠国人信仰如何。要使国人对于主义有最坚固的信仰，最好是亲自跑进后辈青年里面，实地作去。这就是师范。唯有自己亲自到中学小学里努力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反过来说，师范教育本是清苦的事业，这种事业也只有富于革命性的青年才配干！

不如归

物质文明愈进步，则乡村的人民愈往都市奔注。结果，乡村的人口，一天天的减少；都市的住民，一天天的增加。流弊所及，方面极多。例如：（一）与人争利的人，日见减少；与人争利的事，日见增多。（二）人民体质，民族健康，因而退步。（关于这点，我想我国一般人寿的日见缩短，除了兵灾饥馑种种淘汰作用以外，都市生活必是一个重要原因。假如有人能够利用族谱作个中国人寿研究，也许可以证明这种假设。）这种现象，本来不独中国是如此。不过中国的乡村，分外凋弊，人民体格，分外衰弱，对于这种流弊的补救或预防，分外急要罢了！

此外，中国又有两件特殊的事情，使得人口和人才的分布，成了变态的发展。一是政治的扰乱，一是教育的作祟。政治的扰乱，显而易见，不必说了。中国的教育，除了近来一般人都已觉到了的学生程度不佳，文科畸形发展，没有生产能力，不合国情种种弊病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学校的环境和社会的情况相隔太远了。中国本是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中国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却是一座一座的皇宫。学生的家庭，学生出校后所应该去到的地方，本是乡村里最贫苦的地方。可是他们读书的时候，过惯了都市中最奢侈的学校生活。于是毕业以后，大家不愿再去吃苦，宁可挤在城市里和人家去争几十块钱的饭碗。有时明知乡村重要，甚至为本身打算，到乡村去的前途更要光明，可是吃不了苦，宁可自打耳光，放过机会！这又是一个何等凄惨可悲的现

象！

所以，年来大家颇愿提倡“归农”和“回到民间去”。但是提倡尽管提倡，真正实行的却没有几个，这里的原因，自然很复杂。政局不安，富人跑到城市去避难，农村凋弊，穷人跑到城市去找工作，姑且不论。至于一般知识青年，有的明知乡村重要，却是老守在城里，那又是什么道理呢？我想：这除了不能吃苦和极想升官发财之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们不能了解乡村，第二，是乡村也不需要他们。他们不能了解乡村，又有两方面的看法。一是他们没有了解乡村的繁荣对于国家的重要关系，这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了。一是他们没有了解乡村是他们自己的一条最好的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且举出一个例子。这是我的朋友沈君。他在北平一个法政大学读过书，现在长沙乡村经营小规模农业。他说：“没出息，（他是自谦，实际是挖苦我。）一个人在乡下养点蜂，栽点树。蜂养了十群，每群要二十元本钱。一年之后，便可采蜜；春秋两次，每次每群可以出蜜约四十元。另外栽了五千株桐树。树苗不费多钱，乡里山地也极不值钱，只要一点人工去开垦。三年之后，便可结实。五株桐树，可打得一担桐油，时价约值二十元。在这三年以内，那些地上可以栽些棉花，一方面枯了的枝叶可作桐树的肥料，一方面棉花的卖价可以赔补植桐的工钱，这三年之内，便不必另外化钱了。乡下很好玩的，用钱也极省。不过不可用城里的派头，那样乡下人便不会和你来往，办事掣肘，也没有趣味”。后来他去了，我一计算，蜜蜂每年出产八百元，桐油每年产二千元，一共二千八百元，不是等于每月领二三百元薪金的教授科长吗？教授科长有限，也非人人可当，乡下养蜂栽树，只要自己看看书，问问人，不是人人可作，处处可行吗？而且教授科长，全是被别人供养，与人争利，在个人与家庭看来是生利，在国家与社会看来，却是只有消费了；养蜂

栽树，那才是真正的生利呢！至于营谋之苦，生活之糟，更是养蜂栽树者做梦都不至于受的罪了！何况教书办事，全是一种苦闷的工作，工作以后，必求愉快；而在乡村养蜂栽树，工作的本身便是一种愉快，健康长寿，不是自然的结果吗？有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丢着不去干，去大家挤到城里来倾轧，来争夺，这不是由于大家没有了解乡村的好处，或是由于大家愚蠢至于此极了么？

知识青年回到乡村去，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好处，那是没有疑问的了。知识青年回到乡村去，知识可以够用，资本也不需要，都是不必顾虑的了。但是，在回乡以前，观念上却有些必须改正的地方；否则乡村是不需要他们的！第一，“回乡”的目的，是自己去生产，不是对别人去剥削。所以，无论你回去办学也好，办党也好，必得自己有种“与天争利”的职业，再去“为社会服务”。否则“学务老爷”“党部委员”，在乡民徒增负担，压得出气不来，在老爷委员看来，还嫌正薪不够，油水太少，仍住不下的。第二，不要口里唱平等，心目中却不平等。读书人在符号的知识方面，也许比乡下老太婆好；可是乡下老太婆纺棉花放鸭子的本领，有知识青年便赶不上。职业与知识，都只有种类之别，并无贵贱之分的。乡下人诚然老实，可是同类意识却是很强的。看人不起，是终会被人看不起而致影响到事业的。第三，入境要问俗，“俗”有不好的，也只可投身其中，设法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更变，不能站在圈子外面说风凉话，或者强人从己的。我常觉得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与自己的本国人在习惯上态度上格格不入，以致彼此自外，一切事业都难进行；而外国的传教师到了中国，反而能得一般人的合作，是件很可羞耻的事。第四，“行有余力”，便去帮助别人，不要帮助别人增加消费的力量，而要帮助别人怎样去写信，去养猪，换句话说，怎样去求知，去生利。

湖南教育一瞥（节录）

我想就我所知道的和所见到的湖南教育，提出来谈谈。我之所以想谈这个题目，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在十六年以前，湖南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于今是二十二年了，外面又给湖南加上一顶“模范省”的冠冕。我在湖南整整四年了，做过“苏维埃”治下的百姓；做过“模范省”治下的百姓；即以这两重资格来谈点异乡异土的消息，大概是大家所不会反对的。第二，我为什么不谈政治，不谈经济，却捏着这么一个枯燥无味的题目呢？这并不全是为着守着明哲保身之道的缘故，而且一方面因为我与政治无缘，不敢乱说，一方面我自己学的是教育，这四年来办的也是教育，舍了教育不谈，未免忘本，何况教育还是“立国之本”呢！第三，我常自思自想，我们的作者，假如多谈点中国的土货，少搬点洋书；多谈点实事，少发些空论；多注意下内地，眼光别专射在京津沪汉；不讲利害，不讲别人，至少我个人在茶余酒后是愿多翻翻书本的。记得三年以前曾以此意函告《教育杂志》的编者周予同先生，希望他多登点中国教育界的实况。现在我自己提笔了，虽然见闻不够，能力不够，也还是宁愿做个通讯的访员，不敢望做社论的主笔。

此外，还得申明两点。一、我打算写的只是裨官野史，不是正传，不是官书；只是印象，不是定论；这里只有短篇小说中的一点一滴，不像本纪世家的必详必备。想看正传官书的我可以介绍二十一卷二期的《中华教育界》上朱经农先生的“近年来之湖

南教育”。二、我这四年来局处长沙，而且局处在长沙的一个学校，虽则有时“以耳代目”，得着不少的消息，但是“耳闻不如目见”，终恐不详不周，所以我得申明，我的消息来源多半限于长沙，虽则言质言量，长沙都可代表整个的湖南。

我所要谈的只有三宗“事实”。

第一，湖南的私立学校一般的比公立学校“好”。这个“好”字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生的成绩好，一方面是办学者的精神好。学生的成绩好是有客观的证据的。四年来湖南举办了三届高中毕业会考，第一二届平均成绩最好的是明德，明德便是一个私立学校；第三届平均成绩最好的是周南，周南又是一个私立学校；这是就学校而言。湖南举办过三次军训检阅，第一次最好的是明德，第二三次最好是岳云、雅礼；明德也，岳云也，雅礼也，皆私立学校也。湖南每届的全省运动会，总锦标也差不多不出私立学校之手。这是就体育军训而言。至于德育，政府没有举办过比赛，客观标准也不易定，而且湖南学生的风气一般的本都不错，自很难说。不过据大家的意见，私立学校的学生，精神上也似乎更要现得整饬一些。我相信我说的“学生的成绩”并不算胆大，也并不是特别恭维私立学校。说到私立学校“办学者的精神好”，我拿不出数目字，拿不出统计。可是我能拿出几宗事实。第一宗事实是职员方面的。明德的胡子靖先生，三十岁办学，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他如果弃了明德，他有无数次做大官发大财的机会；他因为要办明德，好几次几乎“以身殉学”。可是他宁做几乎“以身殉学”的“磨血工夫”，不去求升官发财的个人快乐。现在他的学生做中委部长的不知多少，可是他仍住着三间破屋，做他的“磨血”工作。此外楚怡的陈凤荒先生，修业的彭国钧先生，妙中的方克刚先生，周南的李士元先生，都很有这种精神。公立学校却没有机会容你干上二三十年了！第二宗事实是教员方面

的。老于教课的朋友都和我说：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好教。公立高中每小时一元六，私立高中多则一元，少则数角；经济上的算盘是如此。公立学校，下课以后多半可以不必多负课外的责任，私立学校花样既多，责任又分外重；工作的情形是如此。然而我有许多朋友，却宁愿受少许报酬，尽多许责任，在私立学校一直教上一二十年课！

依常识而论，私人的力量决赶不上国家的力量，私立学校应该是赶不上公立学校的；而且听说别的省分一般的说来，公立学校也较私立学校好；为什么独独湖南是例外呢？其中原因，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的关系。在制度方面，公立学校的最大缺点在办学人员没有保障。我可以说个最大的笑话给大家听。湖南公立学校的校长，月薪只有百余元，可是今日不保明日，地位是够危险的，听说从前有位初出学校的青年当了校长，他的竞争者竟诬告他，提了去，坐了几月的牢，几次要提出行刑，几乎丧了性命！现在却又证明了他无罪，在中央党部当委员！校长换了，前任校长的聘约照例无效，新校长不加聘书便算辞退了！好像校长之聘教员是以私人资格，不是以法人资格似的！最奇怪的是，教员也视此为当然，从不抗议。私立学校的教职员，虽则也少有法律的保障，只因事情苦，校长不常换，这种怪事便“少”多了。所以有人说，扬州中学之办理得好，其校长不多调人是个大原因；这话是不为无因的。至于人的方面，办私立学校是只有亏吃没有便宜占的，所以愿去的人，无形中间已经经过了一番选择。公立学校呢，调皮者可作为进身之阶，守分者可求衣食之较免冻饿；而政府当局又不慎重人选，以致不是任非其人，便是好的校长不安于位。上下均存五日京兆之心，于是笑话百出，学生吃苦。去年会考以后，有某校学生投函某报，说读了三年高中，换了六个英文教员，只作几次练习。又有人说，

某省立学校共十一班，却有九个国文教员！诸位。人的关系原是很重要的啊！

第二，湖南教育界的思想“变”了。我只能用一个“变”字来代表。我不能说“进步”或“退步”，因为这一“变”之是进是退我并无把握。大家如果嫌我用的“变”字太含混，我可以申明一句，这个“变”字是有几种涵义的。头一宗，他们对于社会、国家的态度变了。马日事变以前，湖南教育界是最爱预闻国家大事的，驱逐张敬尧，响应五四运动，引起六一惨案等等，是他们行动方面的成绩。毛泽东（一师附小教员）之宣传共产主义，左社等之反对赤色思想，是他们在思想方面的表现。就是外省外县，一提到湖南人，就不免联想到“革命”“风潮”“捣乱”等等大家认为不祥的名词；其实革命、风潮、捣乱就是关心个人以外的事物的证据，不过时机对象容有不对而已。现在不然了，湖南教育界里，无论教员学校，极少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极少“衷心”信仰三民主义的，其他一切主义政党，他们简直都视为一丘之貉，不生信仰，甚至不生兴趣。一部分人对于社会国家，有时候心血来潮，固然也不免长吁几口，短叹数声；然而积极方面，他们很少能有什么主张，更难生出什么行动。这是湖南的民气消沉了呢？还是湖南的人民稳重了呢？结论我不敢下，事实确是如此。第二宗是他们对于功课的兴趣变了。这也不独湖南如此，恐怕别处亦复相同。从前没有几个人学数理，现在却大家争着学数理去了。长沙有个高中，取录八十多个新生，只有十多个人自原进文科，因为不好上课，学校便勒令一部分去学文科。听说清华今年的新生愿进法学院的也只有十多个，愿进工学院的占大多数。这种现象之是好是坏，姑不计论，但是连带有一宗事却是大可注意的。一般学生因为太偏重理科了，别方面的知识之贫乏却很值得惊异。我知道有一班初三的学生，学业很好，人都聪明活泼，我极喜欢

他们。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四本杂志，《独立评论》、《华年周刊》、《生活》、《论语》。他们都瞠目结舌，认为闻所未闻，不管钱多，争着要订。他们的好学之心是很可嘉许的，然而他们的知识之不是多方面的发展，也就够可注意了。第三宗是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似乎也不见得和从前一样了。如果从前可用“牺牲”、奋斗”、“乐观”种种积极的形容词来形容的话，现在再用这些形容词就似乎不顶适当了。本来中国的局面是如此其纷乱，把个人压迫得吐不出气来，从前大家心中存下一线希望，曾作一度临危的挣扎，挣扎不得结果之后，精疲力竭，安静地躺一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全国的同胞，近来似乎都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消极态度，我们一面固然应该互相鼓励，提提精神，同时也是不能专怪个人的。湖南教育界都是圆颅方趾的“人”，自然逃不脱这条“人性”法则的支配！

这种改变，如果原因不是单一的话，我想下面几个解释是可以供参考的。头一个解释可以说是心理上的一种反响。从前大家信仰主义，结果主义无效，或且害之；从前大家怀着希望而奋斗，结果希望成为泡影，奋斗毫无代价。我们知道，希望愈大者，失望亦愈大。我们又知道，用力愈劳者，疲劳亦愈快。湖南的各界，在历次革命中都是站在最前线的，而历次革命之后，湖南所受的牺牲蹂躏亦最大。“物极必反”，不也是人情之常吗？第二个解释可以说是一种淘汰作用。一方面湖南因为受党派之祸最烈，所以对于异党异派的排斥也最凶；二方面共产党在湖南的历史最早，势力最大，真是有信仰，受不了现状的痛苦的人，都已走到实际行动中去了。现在剩下的人，或是被排斥后的剩余，或是本没信仰的第三者。第三个解释可以说是由于在上者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本是极大的。举个例说。去年湖南中学毕业会考，国文题目是“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平心而论，题目并不算难，没读

《四书》的也未尝不可以“望文生义”领略题意。可是许多考生不懂题意，闹出不少的笑话，于是考完以后，好些学校勒令初中学生读《四书》，有些学校不肯加授《四书》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竟也要求起来，非读不可。小小一道题目就可以闹得“满城风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几年来中央委员有停办文法科之议，省府主席有“八德衍义”之作，学风之变，不亦宜乎？

第三，湖南学校学生的数量很可观了，质的方面却尚有可以改进之点。据二十一年的湘省教育厅报告（书名《湖南省最近三年教育概况总报告》）说，全省共有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三个小学，二百九十九个中等学校。我们敝县湘乡一县即有一千五百六十一个小学，一十二个中等学校。这等数字比起任何省分都无逊色。学校之所以发达，内中有一个有趣的原因。因为共产党在湖南闹得最凶的时候，有田的人多少都捐出一些田产，去办学校，借以缓和空气。捐田的人多了，学校便自然多起来。加之湖南在湘军时代，出外作官的人很多，作官为的是光宗耀祖，于是大修祠堂。现在祠堂没用，便多改为族学。族学多了，族与族之间互相竞争，于是招收外人，扩大范围，成为正式的学校。至于读书人之多，大概是因为做父母的认学校为新科举，视进学校为找出路之故。从前我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我们全族只有两人，现在却多至十人左右了。我知道某校有个厨工，每月连伙食只能挣十元钱，可是省吃省用，把儿子送到中学毕业现在居然进了大学。还有一个女校的校工，收入更少，她的女儿也在大学，人民对于学校的热心可算是无以复加了！可是学校的成绩呢？有人说，湖南的中学比外省平均好些，因为环境佳，用费省，除了英文赶江浙不上以外，什么都无愧色。我相信这是对的。不过我们同时知道，凡事进展太快，内容便难充实。所以上次会考因为教厅再三吩咐，题